

陇原英烈——

大革命时期的优秀党员任鼎昌

□石颢

任鼎昌,字宜之,1899年4月生于宁县大昌镇任家村一个农民家庭。10岁,他进入大昌镇高等小学读书。这所创建于清末的学校,有好几名贡生任教,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认真,学风浓郁。聪明好学的他,发奋读书,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

1917年,任鼎昌考入平凉的甘肃省立第二中学。他办事稳健,待人诚恳,品学兼优,加上练就的一手好字,受到老师、同学们的赞许。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斗争。消息传来,他十分振奋,关注着运动发展,从报纸上获得大量消息和评论,思想上逐渐觉醒。随着阅读大量进步书刊,他从中汲取了不少新思想新观念,树立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和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理想。

1921年6月,任鼎昌从省立二中毕业,开始在一所学校任教。面对腐败黑暗的社会现状和毫无生气的封建教育,他感到压抑、苦闷。但他不愿放弃自己的追求,决心找到救治这一切的真理。1923年,他毅然放下教鞭,前往北京,考入北京大学深造。在北大他通过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和《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视野为之一新,遂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积极参加进步活动。

1924年初,西北大学在古城西安建立,任鼎昌即转入该校读书。在该校任教的老师中,有不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共产党员,他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受到了教育,并开始在校的领导下,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和他同校学习的还有同乡好友王孝锡等人,他们一起阅读进步书刊,交流和探讨对人生、社会的认识。1925年5月,陕西人民在共产党员魏野畴的领导下,掀起反对军阀的“驱吴运动”,他积极参加。任鼎昌以自己在北京大学参加学生运动的阅历经验,组织指导同学们开展斗争。不久,“五卅”惨案发生,党组织及时领导群众,把反军阀运动与反帝运动结合在一起,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工人的斗争。西北大学作为这一运动的中心,斗争热潮更高。任鼎昌带领同学们走出校门,游行示威、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制造“五卅”惨案的真相,激发了工农大众的爱国热情,声援了上海工人的斗争。这年暑假,党组织号召同学们利用回家机会,广泛宣传“五卅”运动,扩大革命影响。他与王孝锡等几位同乡同学结伴从西安步行回家,一路上逢村过镇,利用各

种机会进行宣传。回到家乡后,他又利用走亲访友、乡邻聚会等时机,向大家介绍国内外大事,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引导大家改变陈规陋习,动员男人剪发,女人放脚,劝导人们戒除烟毒,读书识字。任鼎昌还和王孝锡一起,在宁县大昌镇成立了甘肃省第一个进步青年组织——“青年社”,发展社员30多名,为当时的宁县培育了一批革命后备力量。

1926年4月至11月的守护西安城的斗争中,任鼎昌依照党的指示,积极向市民、学生和士兵开展宣传,鼓动大家克服一切困难,团结一致,全力支持守城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在与城外断绝关系长达8个月之久的艰苦日子里,他不辞辛苦,为稳定城内秩序,安定人心,鼓舞士气,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也经受了锻炼与考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有意义的革命工作。

1927年5月,杨虎城将军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任鼎昌受该部政治部副部长、中共陕甘区党委宣传部长魏野畴推荐,参加该部政治部前方慰劳宣传团工作,随军去商丘、徐州、皖北前线搞宣传慰问活动。他随身携带了大量宣传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及揭露不平等条约的宣传品,在官兵中大量散发,并与他们广交朋友,建立广泛联系。在魏野畴的领导下,他向前线官兵作了大量政治工作,使该部保持了明确的革命目标和旺盛的士气。同年7月中旬,国民军驻陕司令部按照冯玉祥的电令,开始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军内的革命活动,随之又加紧反共清共,搜捕共产党员。由于得到杨虎城将军的保护,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安全离开陕北,返回西安。不久,他又带着党组织的指示信,返回甘肃宁县大昌镇,与1927年8月回到家乡的共产党员王孝锡、胡廷珍、王彦圣、王之经等人会合。按照上级党组织指示,他们一起研究了今后的行动方针和工作计划,决定胡廷珍回河州家乡,他与王孝锡等人留在宁县,分别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坚持革命斗争。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于今大昌镇肖家村成立了中共邠宁支部。王孝锡任书记,王彦圣任组织委员,他任宣传委员,王之经任青年委员。同时,他们又整顿了1925年暑假期间建立起来的“青年社”,发展了一批新社员,以“读书会”形式为掩护,组织大家学习马列主义学说,进行革命宣传,发动当地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斗争,迫使当局撤去贪赃枉法的宁县县长索

呈祥的职务,追回其任意摊派的一笔款子。这一斗争的胜利,影响了周围各县。

1927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作出“于11月派一积极同志,先整顿平凉工作,然后由平凉赴宁夏,即负宁夏工作责任”的工作计划,并指示中共邠宁支部负责落实。受中共邠宁支部书记王孝锡委派,任鼎昌前往平凉,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决定以在平凉师范任教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2月5日,任鼎昌来到平凉,担任平凉师范教师。他利用教社会学的条件,自编教材,向学生讲授社会发展简史和唯物史观,传授进步思想,受到学生的尊敬。为了回复地下党组织,他在平凉郊区歌马店一带与地下党员、共青团员及进步人士积极联络,进行地下活动,使中共平凉特支工作重新恢复了起来。

1928年4月,国民党甘肃省清党委员会派人潜往陇东一带,与当地军政一起,大肆搜捕共产党员。王孝锡在宁县了解到敌人搜捕任鼎昌的消息后,立即写了一封密信,派人连夜送往平凉,通知他立即转移。不料,敌人抢先一天,于4月17日下午将他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共青团员韩庄。4月19日,任鼎昌被敌军用囚车押解兰州,一些进步师生筹集50多块银元,一起赶到西门外送别。任鼎昌谢绝了大家的好意,挥手离去。后来,这些银元通过关系,分几次送到了任鼎昌手里。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任鼎昌始终严守党的机密,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1928年11月,王孝锡不幸被捕,审讯时,敌人让任鼎昌与王孝锡当堂对质,妄图一举突破,达到将陇东共产党一网打尽的目的。任鼎昌再次经受了酷刑折磨,保护了自己的同志与战友。无数次的酷刑折磨,使他遍体鳞伤,双腿不能站立,但他始终以坚定的信念,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他在狱中坚持写日记,期望“风吹乌云散”后光明来临。由于溃烂的伤口发生严重感染,他于1929年10月逝世于狱中,时年仅30岁。

1938年秋,当任鼎昌烈士的遗骨迁回故乡时,宁县东区早于1935年建立起了革命政权,此时正在陕甘宁边区党的领导下,开展着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解放后,任鼎昌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受到褒奖。宁县人民没有忘记曾经生养在自己土地上的人民的优秀儿子,为他建了陵园,用他的事迹激发着一代代青少年的爱党、爱国、爱家乡热情。

2002年,河北省安平县在台城村建起“中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纪念馆以实物、图片、文字等资料展示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中国革命史、建党史上的重要地位,在爱国主义、党风党纪、反腐倡廉教育及红色旅游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由于在这里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这个原本平淡无奇的小村庄才声名远播。

1886年出生在台城村的弓仲韬,父亲是爱国知识分子,早年曾在北京参加了支持维新变法的运动。受其父影响,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向群众宣传反帝反封建和妇女解放的道理。1923年4月,经李大钊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反动政府制造白色恐怖,残酷迫害共产党人,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李大钊对他说:“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只在书斋里不行,只在城里也不行,需要把工农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你在乡下长大,熟悉农村情况,党组织决定派你回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党组织,壮大革命势力。”

按照李大钊的指示,弓仲韬回到了老家安平台城村。1920年到1921年,华北四省爆发大饥荒。弓仲韬反思造成父老乡亲们身陷于水深火热的痛苦之根源,并竭尽所能展开自救和反抗,这是他的使命。他采取的第一步,就是教农民识字,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弓仲韬在村里办起“平民夜校”,自编《平民千字文》做教材,陆续招收了村里的青年和没钱上学的贫家少年50多位学生,3间并不宽敞的校舍被挤得满满当当。在夜校中,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名叫弓凤洲,因为读过两年小学,有一定文化水平,成为日后弓仲韬发展他成为一名党员的重要基础。

办教育、开夜校,是那时乡村党建的普遍方式,弓仲韬是先行者之一。这也正是李大钊对返乡知识青年指出的道路。弓凤洲1905年出生,家里是贫苦雇农出身(中华人民共和成立后,他担任献县税务局局长时,填写简历时写的入党时间是1923年7月。经过中共安平县委多方印证和考察,他是全国第一个农民中国党员)。不久,农民弓成山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村里有了3名党员,弓仲韬向李大钊请示成立党支部,获得批准后,1923年8月,台城村特别党支部正式建立,当时尚没有县委,支部受中共北京区委直接领导,弓仲韬任书记,弓凤洲、弓成山分别任组织、宣传委员。弓凤洲同时担任弓仲韬的交通员,协助弓仲韬传递信件,并负责与天津党组织负责人薄一波同志联络。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位于衡水市安平县的“台城特支”正式诞生了。

其时临近秋收,党支部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发动农民开展“说理斗争”,要求地主增加报酬,减少地租。由于佃户、雇工人多心齐,据理力争,经过几番面对面较量,地主们最终同意了农民的条件。不久,



□安杰

安平县的乡村几乎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农民要求“增酬减租”斗争。

1924年2、3月间,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弓仲韬与安平县北关高小校长李少楼取得了联系,经过二人的通力合作,安平县党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他们先后介绍北关的李春耀、张述增入了党,随后又吸收思敬村的袁大楞、李更入党。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他们先后建立了北关高小和思敬村两个党支部。随后邻近村庄有30多名在斗争中表现出色的农民被吸收入党,先后成立了7个村党支部。到1924年8月,全县已有党员100多名。李大钊对安平县党组织的迅速发展非常欣慰,他写信鼓励弓仲韬继续努力,并指示可建立安平县委,加强党对全县工农运动的领导。1924年8月15日台城村、思敬村和北关高小三个党支部选派了弓仲韬、弓凤洲等9名代表,在思敬村召集召开安平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建立中共河北省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安平县委。党的机关设在弓仲韬家中,将台城特支改为台城支部。这次会议确立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就是发展党组织,壮大革命力量,启发群众觉悟,领导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台城特别支部是我党第一个农村支部。该支部的建立,带动了周边农村党组织的发展,使革命星火在冀中大地上迅速传播,为党在农村地区开展党的工作作出了积极探索。



珍藏

吃元宵、赏花灯、舞狮子、猜灯谜……始于2000多年前秦朝的元宵节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彩灯文化,“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月中旬动地。三百内人连袖舞,一进天上著词声。”而“国家名片”邮票(附图),则将这一文化元素——元宵节彩灯稳稳地定格在历史的门楣上。

1981年2月19日,中国原邮电部发行的T60《宫灯》特种邮票。全套共6枚,主图全部为精巧绝伦的宫灯。宫灯,也称宫廷花灯,是中国古代宫廷内制作并使用的一种照明灯具。由于是宫廷所用,因此在制作上突出了“皇家”特色,做工精细繁复,装饰雍容华贵,充分彰显了帝王家的富贵与奢华。宫灯造型有八角、六角、四角形之分,种类有挂灯、座灯、提灯、壁灯之别。各面画屏图案内容多为龙凤呈祥、福寿延年、吉祥如意等。宫灯用料较为考究,以红木、紫檀木、花梨木、楠木等贵重木材居多,且金银装饰。制作精细,技艺精湛,雕、镂、刻、画无一不备。邮电部发行的T60《宫灯》特种邮票,主图表现的正是中国传统宫灯中的6种代表:花篮



2006-3T《民间灯彩》特种邮票



T60《宫灯》特种邮票

灯、龙球灯、龙凤灯、宝盆灯、草花灯、牡丹灯。每一种宫灯造型都极为雍容大度,做工精美豪华,将中国古代彩灯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呈现出“月满冰轮,灯烧陆地,人踏春阳”的节日喜庆盛况。

2006年2月12日(正月十五),国家邮政部门联合香港特别行政区邮政署、澳门特区邮政局,发行的一套元宵节花灯主题邮票——2006-3T《民间灯彩》特种邮票。全套共5枚,分别选取陕西商洛鱼灯、北京白菜灯、江苏南京莲花灯、浙江仙居龙凤灯、广东佛山花蝶灯作为图案。全套票以鱼、莲、龙凤、蝶、菜为图案,极富民俗特色,寓意“连年有余”“龙凤呈祥”“财源广进”“喜事迭来”,拼出了“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的元宵节日画图。

由于宫灯、花灯、彩灯等被赋予了典型的元宵节文化内涵,因此,元宵节题材的邮票近年来在国内外收藏界颇受尊宠,身价扶摇直上,如T60中的“牡丹灯”邮票,面值60分,而今已涨至180元,足足升值了299倍。



□王吴军

1948年秋至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连续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辉煌胜利,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胜利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此刻,向江南进军,进一步夺取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进而解放全中国,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内出现了固守长江、划江而治的呼声,企图继续统治长江以南地区,这些国民党反动势力认为,此时的共产党军队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他们完全可以凭借长江天险,用空军和海军封锁长江,防止解放军渡过长江去,实行南北划江而治,将中国一分为二。因此,国民党反动势力除了在长江南岸集结残余部队,在长江以北沿岸建立桥头堡之外,又把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国民党海军少将林遵的第二舰队从海上调进了长江,担任从江阴到安庆这一带的江防任务。

林遵是福建省福州人,1905年生于福建福州,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1924年,林遵入烟台海军学校学习;1929年赴英国,先后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朴茨茅斯专科学校学习;1934年毕业回国;1937年,林遵又赴德国学习潜水艇技术。林遵是国民党海军中的少壮派将领,他是一个有着民主思想的爱国军人。在抗日战争结束时,林遵率舰队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收复了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统治,国民党军队内的许多有识之士酝酿着弃暗投

明的思想。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的大型巡洋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率领全舰570多名官兵起义,投奔到党的解放区,把军舰开到了烟台港,毛泽东和朱德亲自致电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祝贺。这件事对林遵的触动非常大,他决心像邓兆祥那样,投奔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中去。于是,林遵秘密派人前往上海和镇江,和中共地下党进行联系,商讨起义的事。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发出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开始了全面渡江战役,百万雄师直捣南京。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命令林遵将他率领的第二舰队开赴南京附近的笆斗山江面集结,桂永清还连夜召见林遵,要林遵务必把第二舰队的所有舰艇带到上海,桂永清声称,只要林遵把第二舰队的所有舰艇带到上海,他就保举林遵升任国民党海军中将副司令。林遵听了桂永清的话,心里暗暗冷笑,桂永清真是白日做梦!

1949年4月23日深夜时分,林遵几入商议,决定在第二天召开各舰长和炮艇队长会议,研究第二舰队的去向这一重大问题。第二天,在各舰长和炮艇队长参加的会议上,绝大多数人赞同马上举行起义,投奔到共产党和解放军中。林遵看到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当即做出了决定:“大家都知道,我们海军的任务应该是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安全,我们反对这场屠杀我们同胞的内战,我们应该和人民站

在一起。现在,我庄严地宣布,第二舰队全体起义,投奔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林遵率领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的1200余名官兵、25艘舰艇举行起义,还给毛泽东发去了致敬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联络部部长张普生拉着林遵的手,极其高兴地说:“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第三野战军首长欢迎你们,并祝贺你们起义成功。”国民党反动派获悉此事后,马上派出6架飞机,对着舰艇进行狂轰滥炸,林遵指挥各舰进行反击。就在这天晚上,起义官兵全部离舰上岸,安全转移。5月18日,毛泽东发来复电,称赞这次起义是“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

林遵率领的第二舰队拥有20多艘军舰,还有几十艘机动巡防炮艇和登陆炮艇,这是国民党海军4个舰队中战斗力较强的一个海军舰队。林遵率领第二舰队在南京笆斗山江面举行的起义,对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个无比沉重的打击,而对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新的军种——海军部队来说,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不可估量的作用。起初,在邓兆祥率领国民党海军的大型巡洋舰“重庆号”全舰570多名官兵起义的时候,毛泽东和朱德在致邓兆祥的贺电中指出:“中国人民极需要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的先锋。”邓兆祥起义时的“重庆号”大型巡洋舰在起义后不久就被蒋介石派飞机炸毁。但参加这次起义的官兵全部安全抵达沈阳。因此,林遵率领的国民党第二舰队的整个起义舰队,是建立中国人民海军的重要基础,林遵、邓兆祥以及他们所率领的所有的起义官兵,成为了参加中国人民海军的先锋。

1949年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正式宣布成立,张爱萍出任海军司令员兼政委,林遵任第一副司令员。这标志着中国人民海军的正式诞生。